

蜀平文史資料

第九輯



目 录

焦子静先生事绩述略杨致祐 田坚初 (1)

铮铮风骨 烈烈壮怀

——忆刘允臣先生马文彦遗稿 (41)

刘允臣“六十自述”文史办公室辑录 (56)

刘允臣以“陕西难民”名义致戴季陶的一封信

.....选自刘允臣日记 (65)

回忆“四、廿六”事件的经过窦多寿 (69)

张中将义安墓志铭徐杭章炳麟 (72)

关于张义安之死韩 圃 (82)

左史的医术与学术孙子武 (85)

艰苦办学的成维道刘听泮 (89)

刘玉林与正风学社强志斌 刘忠厚 (113)

李因笃与顾炎武南志秀 (121)

关于杨三郎的传说与滩里庙会

.....成新铭 刘荣光 张润柏(126)

忆东岳庙旧观.....罗用九(138)

房海水其人其事文史办公室(141)

钟得海的一生.....田坚初(150)

富平石雕艺术渊源.....王翰章(156)

二号铜车马墨玉石底座简介.....冯克举(161)

关于富平的石灰生产.....王克定(163)

对“线润民先生生平简述”一文的商榷

.....线守身(168)

焦子静先生事迹述略

杨致祐 田坚初

焦冰，字子静，（1878—1945）陕西富平东上官乡焦家村人，他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主要人物。他对于培养革命力量，筹设革命基地，掩护革命同志，巩固革命成果，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。现就陕西省所记载的有关史料和我们之所知者，掌握“辛亥革命前期”和“辛亥革命以后”两个部分，加以搜集整理。前者以“当前社会背景促进革命思想的产生”和“彻底破除君主立宪迷梦走上民主革命道路”为主；后者以“为革命出谋划策，呼吁奔走”和“其他”为主，并分别标以小题，以资醒目。现将以上各史迹，概略分述于下：

革命思想的产生

1、受到端方器重，得与省垣名士往来。

子静少时，曾启蒙于朱廷桢先生，因其聪颖过人，深得朱先生嘉许。十四岁，到陕西臬司驿传房^①学吏，数年后，精通业务，对公牍文件处理得井井有条，众皆以能事者目之。性慷慨，好交游，富于抑强扶弱精神。一八九六年春季，在秦晋驿站交接处发生重大错误事件，陕西巡抚端方要了解其真实情况，召驿传房能事者见，众皆怯惧，互相推诿。子静时年十八，毅然求往。端方见而怒斥：“该房经承何不至，而差汝无名孩子前来？”子静镇定地回答：“大人召能事者来见，故使我来，大人欲问何事，请问！”端方奇之，反复考询，子静对答如流。端方非常满意地笑说：“你有胆有识，惜读书太少，训诂之学差耳！今后要殷勤求学，博览群书，勿怠勿荒！”子静归，向臬司中之有学识者经常执经问

难。端方又不时召见，询问学习情况，因此，学识大进。由于端方的赏识，子静之名始大噪。更因其性豪爽，善与人交，得与省垣名士张拜云、张东白、吴宝珊、李仲特、王子端、李桐轩等人结交，经常谈论国事，初步接受了忧国忧民思想和筹思救国救民的方法。

2、自鸦片战争以后，满清的黑暗统治，在列强的侵略逐步深入之下，外交屡屡失败，丧权辱国，其腐朽无能之本质，暴露无遗。特别当华北各省义和团起义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。慈禧太后偕光绪逃来西安。子静年已二十余岁，目睹流亡到陕西的清政府，依然荒淫搜括。陕西人民，饥寒交迫，饿莩载道，致有人食人之惨剧发生。子静亲身体会到慈禧太后之骄奢，光绪皇帝的愁闷，并目睹大阿哥^②之傻贪无厌，赵树翘之沉冤莫明，而这个穷凶极恶，不惜民命的满清政府毫不介意，一面命各省调兵“勤王”，一面促使李鸿章速订卖国条约，延续其卑污耻辱的残命。更激

起了他爱国和民族主义的思想，认为亡国惨祸迫在眉睫，日夜筹思，恨无救国之道，缺乏同谋之士，于是纠合同志创立“自治社”，以开通思想提倡地方自治为宗旨，遂日与李仲特等十余人研究救国之道。

走上民主革命道路

1、首先参加同盟会及其主要活动

1905年8月20日，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创立，並提出了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建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的革命纲领，成为资产阶级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清斗争的旗帜。陕西留日学生井勿幕、康宝忠、赵世钰等进步青年都加入，追随中山先生进行革命。同年冬，井勿幕奉孙中山先生命，由日本回到北京，欲到各处进行革命活动，唯虑沿途之安全问题，先是井崧生以此事密告子静，並商讨掩护之法。子静便秘密告知沿途驿站负责人确实保护。井返陕后，即住驿传房开展革命活

动，並將带回的“孙中山的救国主张”和“同盟会宣言”，作为陕西地区革命主要宣传品，並担负起组织任务。焦子静首先赞允，並劝导“自治社”多数社员参加。同时，创立同盟会组织，并任支部长，领导陕西人民进行反清斗争。并又奔走于蒲城、富平、三原各地，联络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爱国人士，宣传孙中山的救国主张和同盟会的革命纲领，发展同盟会会员。经过将近半年的艰苦工作，发展同盟会会员三十余人。从此开始，改变了以前陕西人民的反清斗争各不相谋的局面。

1906年春，同盟会在三原北极宫召开会员会议，研究吸收会员和推进会务工作，有主张急进多收会员者，有主张缓进少收会员者，经过讨论，决定稳步前进。会后，经子静介绍范紫东、杨介石、刘渭滨、杨介等人加入了同盟会。

1906年夏，井勿幕二次离陕赴日本，而把陕西方面的工作，交由负有重望的会员李仲特、焦

子静负责。并到日本后，和赵世钰等人积极活动筹备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。同年秋，陕西分会在东京成立。

2、恭祭黄陵是对满清宣战的先声

1907年，井勿幕又回到陕西，讨论了恭祭黄陵之事，决定在陵前宣誓，表示复兴民族之决心。约定重阳节前，均到陵前，推定郭希仁张赞元起草祭文，焦子静部署一切，並约定邻省在陕同志一同前往与祭。与祭之人必须乔装前往。先一日，子静由臬署带来公文一角，随有拓碑帖匠数人(均系同志代充)，住居灵地，伪言上宪，需此碑文送人，並负责布置一切，有总管、内巡各二人，以防走风，意外事情的发生。这一天，是阳历的十月十五日，井勿幕、李仲特、焦子静及同盟会员二十余人和会党首领吴虚白也参加。在黄帝陵前，以祭祖为名，进一步统一了思想，在誓文中明确提出了“驱除鞑虏，光复故物，扫除专制政权，建立共和国体”的奋斗目标。

在恭祭黄陵后，子静又创立了“追远会”，柏惠民、纪时若又创立了“勤公社”，各以力之所及联络同志，虽名称不同，而革命主旨一致，这是因为清朝官吏侦察很严，万一被敌人破获，不致全盘毕露。事后不久，井勿幕第三次赴日本。

3、建立革命工作据点

公益书局：为了广泛宣传革命思想，接待联系和团结各地革命同志及各方面进步人士，推动革命工作顺利进行，焦子静和张拜云、吴宝珊三人合资，于1908年（光绪34年）设立革命秘密联络点一公益书局，地址初在南院门，后移竹笆市，附设印字馆。名义上是：经销书籍文具、纸张等业务，办理印刷事项，实际上运销书籍，除一般文化读物外，主要是从日本、上海等地，通过各种渠道运来的《民报》、《夏声》、《铁表》、《革命与立宪论之激战》等革命书刊，还秘密翻印反清斗争急需的革命刊物。在进货时，都由书局夹运回来，然后分发各地同志学习，遇有急要宣传的刊物和革命文件，就由印字馆翻

印，广为传播，因此，它就与文化界紧密结合，成为知识分子寻求新知识的地方，每天来往文化界的人士络绎不绝，也成为西安的文化中心枢纽。有了这个秘密据点，不但解决了同志临时吃住问题，更重要的是及时交流革命思想，掌握革命动态，密切同志间的关系，推动革命行动，成为外省外县的同盟会员和其他先进人物联络感情，交换意见的主要地点，更成为推动革命运动的中心。例如1908年声援“蒲案”^②的斗争，就是以公益书局为策源地。

健本学堂：子静身处臬司，目睹反动腐朽的清家王朝。处处丧权辱国，残酷压迫人民、剥削人民之罪恶，认为非从根本推翻满清反动统治不可，否则必招致亡国灭种之惨祸。为了革命迅速开展，并能相应的扩大革命势力，继往开来，这时革命培养人材问题极关重要。又念当时在陕公办学堂过少，且均受清政府严密监视。师生言行稍一不慎，立予开除，甚至正法，且要株连亲属。欲从官办学堂打开缺口而为革命培养人材，

颇感困难。基于上述原因，逐步产生自办学堂的动机。子静将此事转商于张拜云、吴宝珊、张东白、王子端、李采白、李仲特、任师竹等人，都得到赞许，并责成子静负责主办。

1908年夏季，子静开始筹设健本学堂的经费、校址及延师招生等问题。校址议定为富平会馆；经费先由驿传房持出多年积蓄在西大街购置商房三处，以每月房金收入补贴学校经费开支外，大部分全由子静筹措；在教学上，聘请知名进步人士担任教员；在学生上，多收外县有志青年，既不限制资格，又不拘定年龄，这样，有易于接受宣传提高政治觉悟，达到培养革命干部的目的。校长初由王伟斋继由王子端担任，教员分常任与兼任两种。常任教员先后有常铭卿、陈会亭、程孝先、范味腴、李天佐、马彦翀、师仲藩、蒋仲三、田玉寿、南仙洲、师仲芳、周受天、岳持斋等人；兼任教员有宋向辰、杨西堂、景梅九、景雨麓等人，系义务职；不支薪的有井

勿幕、任师竹、李仲特、李桐轩、张系若、严敬斋、邹子良、郭希仁、师子敬、焦子静等人，不定时到校，给学生精神讲话，揭露清政府丧权辱国、残酷压榨人民的种种罪行，以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，还有在新军中哥老会的张云山、万炳南。新军中同盟会钱鼎、党自新、张百英等也常去学校和同盟会员接头。因此，在辛亥革命暴发时，健本学堂学生由于平时受革命思想的灌输，而对辛亥革命献身参加者接踵而至。例如学生中的胡景翼、杨瑞轩等在“逐陆”“反陈”的过程中，建立卓勋。尤其胡景翼在“逐陆”“反陈”之后，树立起“国民军第二军”举行首都革命，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，解决国事，更建殊勋。其他学生如：黄仲涵、刘振邦、周诚斋、赵子文、刘恢侠、焦拯、李伯恂、蒋仁山、范仲武、杨海艇、冯尔革（因系共产党员被胡匪宗南活埋）等在不同的岗位上，对辛亥革均起有力推动作用。这一据点，有不少革命人士，每由外地活动来省，

就住在这个学校。学校的教职员，大多数是以教学为名，秘密从事革命活动，遇有风吹草动，他们藉学校掩护，才能化险为夷，平安渡过。

至于学校经费的开支，除义务教职员外，每年全校伙食，用于杂项和常任教员的工资等，至少也需要银千两左右。这些费用全由子静负责筹措，自始至终，从未因经费问题而影响校务的进行，这一点深受各界爱国人士的崇敬。

健本学校的西偏院，原是富平武生每届考试来省应考的人练武场。那里设有铁大刀、硬弓箭、锁子石等，革命志士借练习武艺为名，不时聚集。新军中的思想进步者也常来到学校和师生接头联系，相机进行活动，因而在辛亥革命起义前，起了不小的宣传作用。

驿传房：子静利用驿传房这一机构，作为掩护革命秘密活动的据点。驿传房是按察司衙门的一个科房，主要任务是管理各地驿站，送达重要公文，传递消息情报。当时子静充任该房经承，

同时兼管三原驿站事务。这是一个交通机构，不仅消息灵通而且联系面相当广泛。如何利用这一机构，掩护同盟会秘密活动，是要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的。驿传房的房址在衙门的东偏院，地方偏僻，内部人员情感融洽；对外有官府衙门一块招牌作掩护，内部有班头通消息，确比公益书局、健本学堂安全得多。因此，每遇革命重大活动事项，多在驿传房会商，若遇同志遇难，也住驿传房院内，这是一般人对驿传房的底细还是摸不清楚，其实驿传房的活动范围广泛，对革命起的作用很大，凡从外省外县来省联络的革命党人，为图机密与安全，多留在这里，如：四川的谢广持，山西的李岐山、花芳五、张石生、郭质生、景敬之，直隶的郭瑞甫、刘谷峰、童效先、杜仲伏、赵柱子，山东的刘冠三以及本省各县的樊灵山、纪时若、王仙坪、张奚若等。有时还掩护了革命同志即时脱险，如：郑思诚在原籍定边县犯案逃省，与马彦祥取得联系，请焦子静与王

子端代郑鸣冤，不料冤状递到巡抚衙门，靖边已来文提郑归案，幸有班头王茂亭通风报信，才把郑隐藏在驿传房，待风声稍松，才送郑回县秘密进行革命活动。第二年省城起义，郑率领马队几百人，南来协助反正，为革命贡献力量。这是1910年9月间的事。1903年于右任中举人。同年冬，因在《半哭半笑楼》诗稿中讥刺时政，总督升允即以“逆竖倡言革命，大逆不道”入奏。1904年得到清廷“准予拿办”的批语，经过驿传房，被子静探悉，即告知李雨亭。此时于应礼部试于开封，即暗地派人通知他。于右任闻讯潜逃上海，经人介绍得识马相伯，因马氏入震旦学院肄业，改名刘学裕。从此愈倾向革命。

由于子静大力举办西安三个革命活动据点，从此各地革命同志的连系更加密切，革命活动更趋积极了。更因他善于排难解纷，急人之急，同志中多以“及时雨”呼之。

4、兴立司马窝渡口

司马窝位于渭桥东十余里属高陵县辖治，先是河北居民在河南有地耕种，来往设有简便的木筏过渡，以后逐渐扩大按时渡人，演变而成渡口，甚至有几家居民，合资造船，成为正式渡口来往之人日益增多。嗣因渭桥方面人多势重，为了独揽其利，压制司马窝渡口，不准营业，只留渭桥一个渡口，每天人多拥挤，兼有政府军队联合设卡，每一行客都要盘查询问，往往自朝至暮不得过渡，废时失事，行者叫苦。1906年行客中之好事者，唆使司马窝船户向高陵县署告状，县署因司马窝渡口未经县署立案，未蒙照准。司马窝船户不服上诉臬司衙门，此案由驿传房经办，子静探悉得情，极力主张开兴司马窝渡口，并用政府力量，签请批准司马窝成为正式渡口，立案发证，火速令其营业。因此，不但予该地船户、旅客造成福利，尤其对于革命奔走者大开了方便之门。如王一山为了联系各党人，河北送信，白雨亭为了高、耿、郭互通消息，每次都由此渡口通